

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从政治与道德相互关系的角度

刘 再 起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再起(1967-), 男, 湖南常宁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俄罗斯政治、历史与文化研究。

[摘 要] 俄罗斯是个特殊的社会政治体系, 政治上的专制与暴力及其虚无主义的道德说教铸成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政治发展模式: 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政治发展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精英手中。

[关键词] 俄罗斯; 政治发展; 精英政治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6-0791-04

一

俄罗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俄罗斯在和已经走在前面的地缘政治对手竞争的环境中, 为了生存和安全, 需要大力扩张而又缺乏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财政、教育、职业技能、心理和其他资源)。这种缺乏是以下几种因素造成的: 复杂(寒冷)的自然气候条件决定了社会剩余产品的总体匮乏; 外部政治环境不利(频繁的外部入侵造成俄罗斯国防开支水平历来偏高, 个别时期甚至占到国家预算的 50% 到 90%); 俄罗斯与先进国家的竞争与发展。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 就使得本来发展时间不足的俄罗斯, 必须加紧(加速)进行现代化。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几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 正是大规模社会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时期: 15—17 世纪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18 世纪初帝国模式(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国家的形成; 20 世纪 30—50 年代工业现代化的实现。

俄罗斯缺乏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 这就注定了它在政治活动中要广泛使用强制手段和暴力, 不论是在政权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中, 还是在统治阶层的范围内都是如此: 俄罗斯统治阶层最重要的内部矛盾, 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和最高行政——政治官僚集团之间的对立。著名俄罗斯学者 B.O. 克柳切夫斯基写道, 俄罗斯历史的规律是“政府, 更确切地说是被理解为某个政府的国家和它自己各个机关的斗争”^[1](第 7 页)。伊凡雷帝为抑制大贵族实施的沙皇特辖区制、彼得一世和旧莫斯科贵族的斗争以及斯大林的惨绝人寰的政治清洗, 这些都可以看做是这种政治斗争的高峰。俄罗斯采用政治暴力的用意, 在于加速政治发展和最大限度地动用统治阶层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就其实质而言, 大规模使用强制手段和暴力起着弥补其他资源(物质、财政、人力、时间、心理等)不足的作用。可以作为这种例子的有农奴制。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 C.M. 索洛维约夫写道: “而农奴制——它又是哪里来的? 还是由于那种贫困。迫使农民固定在一个地方, 是要让他养活地主, 养活打仗的人, 因为贫穷国家没有别的方法养活他

们……把农民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是经济上走投无路的国家发出的绝望的哀号。”^[2] (第 628, 432 页)

既然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对权力和事物的垄断包罗万象,那么这种管理体制就只能有条件地称为管制体制,因为它实际上是行政命令主义的管理体制,因为它是在不存在任何与之竞争的权力中心和权力主体的情况下实施的。1905 年 10 月 17 日,著名的《尼古拉二世诏书》颁布。这份文件宣布了俄罗斯第一个代表制权力机关——国家杜马(在它的框架内,跟国家利益不同的利益有机会表达出来)的产生,它打开了建立政党和各种运动(作为有别于国家的权力关系主体)的道路,宣布了言论自由(从而有可能利用大众传媒作为表达不同于国家的权力中心的利益的工具)。然而,时间不太长,20 世纪 20 年代,除俄共(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党均被强制解散,因此,在俄罗斯国内事实上确立了一党制政治体制。直到 1990 年,俄罗斯废除了 1977 年苏联宪法的第 6 条,该条宣称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和领导力量是苏联共产党。多党制政治体制开始形成,开创了表达不同于国家的利益的机会。以官僚机构为代表的俄罗斯不再是垄断的管理主体,而政治则真正成为不同政治力量在权力分配方面进行竞争的领域。

二

在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独占主导地位的管理模式(其实质是管制模式)的范围内,人民充当的角色不是公民(政治管理主体),而是行政管理客体,这就决定了居民要被排挤出政治(权力)关系的范围。这种管制方法必须以广泛使用经济以外的强制手段甚至人身暴力为前提。

在当代的俄罗斯,尽管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但传统的强制手段的领导模式依旧根深蒂固。例如,对居民心目中的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 Б. 叶利钦形象的变化情况所进行的政治心理调查的结果可以说明这一点。1993 年 10 月,一些政治心理学家曾经研究过 10 月 3—4 日悲剧事件以后叶利钦在莫斯科的支持率有什么变化。本来合乎逻辑的预料是,不管被调查者意识形态上的好恶如何,叶利钦的支持率都会一落千丈,因为在城市里采取军事手段会极大地降低安全水平。调查结果显示叶利钦的支持率真的下降了——但比例不大。倘若美国国会遭到坦克的猛烈扫射,而下命令的是美国总统,那么这位总统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具政治僵尸。叶利钦的支持率保持稳定,可能的解释之一就是:就俄罗斯民众的意识水平看来,现任领导人就是在局势危急时不惜“使用武力”的人。按照这类意识的标准,就连嗜酒这种恶习也比当个 М. 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妻管严”要好。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需解剖俄罗斯政治意识中的几个特殊的理念:国家中心主义是俄罗斯意识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东西。加强国家观念、巩固国家机构向来被民众视为克服危机和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俄罗斯历史上不论是帝俄专制时代,还是苏联实行动员式的发展阶段,国家总是执行“征地”(扩张)任务,而政权则是执行这些任务的基础。这种制度目的明确,为巩固“强国”的理念服务,制度本身则是强国的具体体现。强国观念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国家建设中起过使文化得以形成的作用。“伟大”和“荣誉”的观念则使得“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文化”的神话成分相应地有了现实意义,它赞同这样一种期望,即俄罗斯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一种宗教似的、喜欢强加于人的信念)。俄国学者 И. Г. 雅科文科正确地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类型决定了社会的各种形式”^[3] (第 49 页)。久而久之,俄罗斯思维方式中的国家中心主义就变成对最高权力的神圣化,同时在民众意识中,领袖形象一成不变的本质属性,不是他协调各方立场并达成妥协的能力,而是他善于强加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和排列权力关系中的职位等级。对领袖地位本质的这种理解,对俄罗斯政权机关和其他主体而言都是很典型的。生硬的领导作风不是为了取得效果而工作,善于支配别人而不情愿以理服人——这就是俄罗斯社会群体各个层面确立领袖地位的关键意识和机制。

不论是在统治阶层和各阶层民众的关系中,还是在统治阶层本身的范围内,都采用强迫手段和暴力,这是长达 500 年俄罗斯形成的一种传统,即暴力被确定为政治交流最有效的手段,并因此形成了一种对立类型的政治文化,它不同于在分散组成的权力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协商加手腕型的政治文化。

俄罗斯政治发展中暴力的持续实践,引发了人们对政治自由的尝试。进行这种尝试的既有统治阶层(“悔过的贵族”已成为俄罗斯政治固定不变的传统),也有政治反对派,即反对派政治精英。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尝试大多是用暴力方法进行的。可资证明的有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活动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例如,帕维尔·彼斯捷里的《俄罗斯真理》中拟议的建立公正制度的方法就很有代表性,它包括了广泛采用暴力方法,甚至包括建立独裁制度和对执政的王朝实行镇压。激进专权类型的政治意识的基础是把暴力信奉为政治的万能手腕,其基本原则就是谢苗·弗兰克所描述的“爱在远方”、为此牺牲“近者”利益的原则。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道德说教,成为这种政治意识方式的最重要的表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说教,只是它的虚无主义的表现和反映……我说的虚无主义,指的是否定或者不承认绝对(客观)价值”。同时,“对未来的大爱产生出对人们的大恨,构建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毁灭的激情,而虔诚的民粹派社会党人则变成革命者^[4]”(第84-85,95页)。

在俄罗斯,政治自由化尝试的意义在于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和当权者进行斗争,并加速政治发展。然而,这些尝试近似于“揠苗助长”。这种尝试的结局总是使历史向后倒退。依靠暴力实现自由化的结果通常都是政治上的反动,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暴力的加剧而不是缓和。尼古拉一世的保守统治正是对十二月党人激进主义的反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保守统治同样是对民粹派恐怖活动的反动。而反动的阴森森的规律则是“象征物的前后呼应”:1826年处死十二月党人用的是五座绞刑架。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统治者阶层的心态属于政治现实主义范畴。他们强调政治中永恒不变的是“利益”的概念,因此政治必须以实现利益为目标不断发生变化。政治的实质可以用一句名言来表达:“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种相互关系在G.W.F.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达得最为准确:“世界历史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行进,它高于道德所属的境界,高于个人思想方式、个人良心、个人意志和行为方式组成的境界……神意创造的东西高于义务、责任能力和要求,这些东西都属于个人,属于个人的道德方面……因此,伟大人物的事业,那些世界历史个人的事业不仅具有不自觉的内在性,而且从世俗观点看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据此对世界历史事业和完成这些事业的人提出完全不合时宜的要求”^[6](第114-115页)。换句话说,世界精神的道德观不同于个人道德。

这并不是说政治按其定义而言是不道德的,只不过这里的道德是另一种基本标准。这种标准的实质在于政治要符合民族和国家利益。由此产生出非常简单而又实用的评判政治道德(或不道德)程度的标准:合乎我的国家利益的方针就是合乎道德的政治。同时,具体某个政治家作为私人的个人道德是否正确可靠,则是次要的问题(政治上“成熟”的社会对这个问题态度的模式极好地表现在对克林顿的评价上:在普通的美国人的意识里,对前总统克林顿作为私人和作为政治家的评价的区分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在性丑闻闹得沸沸扬扬时,他的支持率也没有降至60%以下;对美国公民而言,重要的是他作为总统的工作业绩)。从遵守“私人”道德的民众意识的观点看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指二战前夕1939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个极不道德的政治步骤,而从政治现实主义观点看来,这个条约可以看成是有理有据、甚至对俄罗斯来说是必须的一个条约。无怪乎1989年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废除该条约,成为国际关系中雅尔塔一波茨坦体制崩溃的前奏。

三

俄罗斯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掌权人物试图转而采取政治理想主义方针的事例,然而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些尝试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如苏联的第一个总统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把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标准混为一谈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可以举“神圣同盟”为例。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曾经有过浪漫的幻想,认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可以建立神圣同盟,即历史上第一个以欧洲各国利益平衡为基础的全欧安全体系,然而这种尝试未能成功,因为俄罗斯过去的反拿破仑的盟友们用暗中达成协议的政策对抗该同盟。但这并不是罪过,而是西方外交的力量所在,这种外交的

出发点是“利益第一”这条永恒的原则。正是这条原则一直为塔列兰、梅特涅、俾斯麦等人所遵循。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政时期新版的俄罗斯版政治理想主义也遭到了重大失败。“我们和全世界的新思维”和“回归文明民族大家庭”的政策成为地缘政治崩溃的起动机,不仅苏维埃帝国,而且这个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一波茨坦体系,以及与之相连的全球战略稳定体系都随之崩溃。“改革”时期和“改革以后”时期的道德说教——拜物教(金钱崇拜),在俄罗斯成了有效的政治。20 世纪 90 年代在俄罗斯政治中的肤浅的、不令人信服(因为俄罗斯人已经有了 70 年的虚泛的道德说教,从而使得俄罗斯人对一切的政治动员和道德说教都变得极为反感,处世态度也极为玩世不恭)的道德说教的结果,是俄罗斯国家地缘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社会价值观的全面崩溃。

目前,俄罗斯政治越来越不讲道德,甚至疯狂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加区分地排挤和对法西斯头子的盲目崇拜,特别是,转型时代成长的年轻一代,他们习惯了传统的政治与文化,而这一切又不曾亲身经历,历史的虚无主义与毫无理智的极端民族主义造就了俄罗斯“光头党”这一政治怪胎。在俄罗斯,由于政治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相对比较年轻,而“私人”道德又起着调节一般社会关系(它和特殊的政治关系不同)的作用,因此,政治所固有的特殊规范和机制往往不知不觉地换成了在公认的“私人”道德框架内的那些规范和机制。因此,受道德调节的社会生活范围正在缩小,因为运用“私人”道德来调节政治关系的做法受到限制,而这一过程是合理和适当的,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得益于当今俄罗斯的群众意识正在逐渐摆脱多余的道德说教,变得更加实用,并逐渐接受合乎情理的利己主义。乌克兰有句谚语说:“如果政治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友谊,那你就会明白:该把腌肥膘肉好好藏起来;如果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兄弟情谊,那就要检查一下钱包还在不在老地方。”世界政治的全部实践都证实这条谚语是正确的。

[参 考 文 献]

- [1] В.О.Ключевский.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Полны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в трех книгах; Кн.2[М]. М.:1993.
- [2] С.М.Соловьев. Читения и рассказы по истории[М]. М.:1989.
- [3] Яковенко.И.Г..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России [J].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4, (2).
- [4] С.Л.Франк. Этика ни илизм[М]. С.Л.Франк.Сочинения. М.:1999.
- [5] М.Вебер.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призвание и профессия[М]. М.Вебер.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1999.
- [6] Г.-В.-Ф.Гель.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М]. М.:1993.

(责任编辑 叶娟丽)

On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U Zaiq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Zaiqi (1967-), male, Doctor,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Russian.

Abstract: Russia is an uniqu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ty, despotism in polity and nihilism in moral dogma are typical refle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polity and morality. In Russia, polity is swallowed by administration; this unique phenomenon results in a series of severe consequen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y and morality. Public are excluded out of polity, they have no chance to comprehend the trait of polity, not to speak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litical-morality.

Key words: Russia; polity; morality; inter-relation